

■周三有约

文·李亚光

对于刚迎来高铁不久的青藏高原铁路人而言,今年春运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大考”。从大年三十至今,为确保高铁安全、平稳运行,巨天和几乎从未离开过工作岗位。

巨天和是青藏高原首个动车运用所的首席调度员,连续指挥两列高铁完成维护、检修任务后,他依旧精神饱满。

50米外的另一个工作间里,妻子李红梅正在分门别类地整理高铁检修用具,虽与丈夫仅隔三堵墙,但在工作中他们却很难见面。“能对讲机里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感到满足和安定。”李红梅说,动车运用所既是高铁的家,也是他们的家,入职至今,他们都在以这种方式相互“陪伴”。

青藏高原上的“高铁伉俪”

今年万家团圆之时,巨天和迎不来不能在家度过的第20个春节,昔日工作相对清闲、常数落丈夫的李红梅也步了他的“后尘”。“刚得知我俩双双入选青海首批高铁后备人才库的消息时,我在激动之余就有一丝莫名担心。”李红梅说,大年初二半夜2点下班,看到女儿只有玩具熊陪伴,一向要强的她不禁潸然泪下。

然而,这对高铁伉俪从未因工作选择而感到后悔。身为青藏高原本土生长的“铁二代”,他们对高铁速度有着特殊的情怀。

2014年12月底,在兰新高铁最后的联调联试阶段,火车第一次在青藏高原大地上跑出每小时270公里的速度。看到高铁在百米外呼啸而

过,守在窗边的巨天和和李红梅顾不上“矜持”,激动地抱在一起。

“有速度才能有发展,这是老铁路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们奋斗大半辈子的梦想。”李红梅说,“高铁对发达地区而言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对交通闭塞、地广人稀的青藏高原来说,这就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然而,巨天和和李红梅深知,追求速度的同时更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在青藏高原高寒、高海拔、强风沙中往返的高铁对安全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巨天和说,由于接触高铁不久,他们常主动要求加班熟悉业务,回家后也经常讨论工作、交换观点,希望能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中尽快积

累更多高铁运维经验。

“能看出他们两口是真心热爱自己的岗位,把工作都干出了‘花’。”西宁动车运用所党委书记张宏刚告诉记者,通过连夜查阅资料、询问专家,巨天和结合青藏高原特点为高铁检修调度方案补充了不少点子,获得同事一致认可;而李红梅则别出心裁地将检修工具摆成蝴蝶、爱心、“CRH5”字样等形状,既美观又利于工具的清点、发放。

“拼搏和付出是铁路人的信仰,我愿以热情和信仰守望高铁时速。”巨天和说,当安全、洁净如新的高铁每天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从中国海拔最高的高铁动车运用所驶出时,他夜晚所有的疲惫都会在那一刻烟消云散。

■人物点击

九旬老人吴国璋:为北京交大节水“5个昆明湖”

在北京交通大学一栋白色小楼上,今年89岁的吴国璋老人正在办公。作为一名高校节能领域工作了多年的“老兵”,他通过30多年努力在校园推广节水技术,节水量相当于5个昆明湖。



1985年,北京交通大学曾因为用水严重超标被北京市罚款14万元,这在当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校下决心成立了节能办公室,委派59岁的吴国璋当主任。他把节能这项“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当成自己的使命。1年后,交大用水量大幅下降;3年后,交大被评为北京市节水先进单位;10年后,他研究的一套水量平衡测试体系在首都各高校陆续推广开。“隔膜式脚踏淋浴器”、“不滴水嘴”、“延时自闭阀”、“大小便自动红外冲洗器”、“绿地微配管系统”、“北京交大雨水拦截工程”……说起曾经使用过的节水方法,吴国璋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在建筑面积、人员不断增加情况下,北京交大用水量10年保持不变,这让吴老师十分欣慰。“现在南水北调工程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一些人认为南水北调以后水就多了,可以放心用。”他说,这种看法不对,节约用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余晨:互联网可帮助传统行业成功转型

“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它放眼世界,是全世界的财富。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大多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以及投资,如何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转型是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要做的就是利用互联网帮助传统行业成功转型。”余晨说。



易宝支付高级副总裁及联合创始人余晨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和软件领域有近20年的经验。互联网创新,是余晨近年来探索并致力发展的事业。创建易宝支付之前,他曾任美国甲骨文总公司主管、产品市场经理,负责推广甲骨文的应用服务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及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他曾先后在美国德州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担任职位,还曾任美国硅谷中国无线协会理事,获得过美国伊利理工大学计算机硕士学位和北京大学的计算机学士学位。

关于创新,“创新就是从0到1,创造新的价值、新的可能性、新的东西,这是面向未来的。”余晨说,但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创新是个结果,从0到1,从1到n,是两个范畴的总结,前者是垂直思维,是指达到一个新高度,从一维空间变成二维空间,属于纵向传播;后者是水平思维,是在平面里复制,属于横向传播。

(马爱平)

代表委员里的“新人”与“老兵”

两会帷幕刚刚落下,那些或振奋人心、或发人深省的建议提案从各个角度牵动着国人的注意力,而那些出镜率高的代表委员,往往在日常

“新人”的第一份履职建议

“这是我当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第一份履职建议。”一见面,巨晓林就拿出几页纸兴奋地说。

巨晓林现在是在中国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的高级技师,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去年12月底,北京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补选巨晓林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七八天是我这辈子最忙的几天。从3月3日到驻地报到后,除了开会,就是读各种报告和说明材料。”他说。

从25岁被中铁电气化局在老家陕西岐山县招工后,巨晓林在岗位上干了一干就是28年。虽然身高只有1.62米,但在铁路电气化这个行当里,却被称为“小巨人”:20多年来,只有高中学历的巨晓林共写下了80多本、数十万字的工作笔记,创新了85项施工方法,创造经济效益1000多万元。他主编的《接触网施工经验和方法》已经成为工具书,填补了国内铁路接触网施工技能培训教材的空白。

这么能钻研的“小巨人”,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后还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当上全国人大代表,我更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低,要赶紧补课。财政预算报告我到现在还没看完,大会上发的七八本阅读材料,我才读到第五本。”巨晓林说起这事有点不好意思。

记者问他怎么读得这么慢。他说:“这些报告和材料我都是逐字逐句读的,好多东西,像预算报告、立法修正案草案都很专业,凡是有搞不懂的词我就要上网查。发下报告后的这几天,我每天要读到凌晨2点,第二天早上5点多起来接着边看边查。”

除了要尽快阅读大会的各种报告和材料,

“老兵”8年30余提案直谏改革

“中国下一个六年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是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我建议将服务业占比纳入‘十三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全国两会上,年过六旬的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每次都会向围堵他的国内外记者详细介绍自己的提案。

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去年迟福林赴湖北、甘肃进行了一系列调研。之后,他提出实现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不仅可以消化当前全面过剩的产能,还可有效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我国6%—7%的经济增长新常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是政协队伍中的“老兵”,曾两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今年,他带来5份提案,3份发言材料,其中两份提案是调研之后形成的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建议。小组讨论会上,迟福林作了充满激情的发言:“我国正处于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历史节点,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关键是谋划、把握‘十三五’在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上取得阶段性成果。”会后,一些参会者还找到迟福林进一步交流看法。

■第二看台

专注梦想 孕育稻香丰年

文·胡英明

“只要你专注这片土地,你的收获会很多。”九三学社贵州省委主委,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首席水稻育种专家黄宗洪这样说。在水稻育种科研道路上,这份专注始终伴随着他。在田间和实验室里挥洒青春的汗水;接受烈日酷暑的考验与暴风骤雨的洗礼;在他的生活中留下无数个坚实的脚印……

终于,黄宗洪收获了至高的荣誉——他参与的“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2014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该获奖项目由袁隆平院士领衔完成,是继三系法杂交水稻之后的又一重大创新,将水稻亩产量由700公斤提高到988公斤,为我国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面对荣誉,黄宗洪显得从容淡然:“成绩和奖项是属于大家的,是整个科研团队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就在外界为他获得殊荣欢呼雀跃之时,他却将荣誉收入囊中,返回三亚繁基地,再次

生活中就是媒体眼中的“常客”。在两会热度还未消退之际,我们将目光放在了这几位普通而又平凡的参会者身上,看看声音背后的他们。

巨晓林每天还要准备第二天的发言。虽然他不可能每天都在团组讨论上轮到机会发言,但还是精心准备。

“北京团的第一天讨论我本来准备好了发言材料,但听了一下其他代表的发言,觉得还是他们水平高,看问题看得透,我还得回去再整理补充一下。”他说。

晚上回到房间,巨晓林结合政府工作报告,连夜修改、补充他向大会提交的第一份建议《适应依法治国,加强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离乡背井进入城市,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不可或缺的群体。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既是适应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农民工的迫切愿望。”巨晓林在建议中写道。

巨晓林现在已经成为外来务工人员中的杰出代表,不仅被选为中共十八大代表,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但在骨子里,他还是一名农民工。妻子还在岐山县,儿子在县城里一家汽车修理铺当喷漆工。吃一碗臊子面,要比在宾馆里吃自助餐舒服得多。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第一份建议,巨晓林提到,加强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必须多管齐下: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体系,针对农民工的职业特点,建立农民工的分层保障体系;切实运用法律和执法单位依法办事,落实农民工同工同酬、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规范;有关部门定期为农民工开展法律咨询等活动。

“虽然我前两年已经被单位聘为正式职工,但我当了20多年的农民工,深知农民工想要什么。”巨晓林说。



“虽然我前两年已经被单位聘为正式职工,但我当了20多年的农民工,深知农民工想要什么。”

“尽管我已是‘60后’,调查研究还可以做下去,还可以继续为改革献言。”



“当委员、搞调研,就好像解数学题,层层剥茧才会发现问题的本质。”

感觉自己还是蛮拼的,劲头还是蛮足的。”

从事改革研究30年的迟福林,既是改革的推动者,也是“自己改变自己”的实践者。上世纪80年代,他投身改革洪流,此后参与了海南建省筹备工作。在担任中改院负责人后,为了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他还亲自操刀研究院从事业单位向自负盈亏智库的改制。

“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大趋势的形成,民间智库

的发展条件和机遇都比以往好,未来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迟福林说,当前公众对民间智库的声音越来越关注,如何进一步提升研究院的研究水平,培养中青年改革研究人才,是他目前感受到的一个最大压力。

迟福林说,自己没有硬性的退休年龄,“尽管我已是‘60后’,调查研究还可以做下去,还可以继续为改革献言。”

“学霸”不解数学题关注留守儿童

“当委员、搞调研,就好像解数学题,层层剥茧才会发现问题的本质。”郭晋云这样形象地向记者比喻。

郭晋云是个数学“学霸”。他长期从事代数数学研究及数学专业课程教学,在国内最早从事代数表示论研究,还是国内最早从事霍尔代数研究的学者之一。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郭晋云的每次调研、写提案,就像解一道数学题:发现问题时通过认真观察、层层推理,把搜集到的情况、数据进行联系、类比,然后逐项求证,最终获得最科学的答案。通过努力,他将大家关心的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层层剥茧”,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和履职风格。

(据新华网)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不好,这个问题引起了他的重视。在业余时间,他深入全省各地农村,走访了上百名留守儿童。细致的走访让他感受到:父母不在身边,没人监督,只是农村留守儿童学习不好的表象,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又走访了留守儿童的学校、相关教育部门,查阅了国内外关于儿童教育的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研究,并逐步求解。

这些年,郭晋云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今年两会上,他涉及的内容已经触及加强偏远地区土地流转工作、建立国家和省级灾难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等问题,不少意见建议受到媒体关注。

矿山“老抠儿”刘金玉:修旧利废5年增效约3000万元

刘金玉是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焦作煤业公司九里山煤矿修旧利废班班长。仅2009年至今,刘金玉每个月回收的废料都在1.5吨以上,同事们为此给刘金玉起了个外号“老抠儿”。



一次,矿上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及学习焦裕禄精神座谈会,刘金玉作为劳模代表参加。临到刘金玉发言,他却列举了一大堆矿上浪费的现象。比如,经常使用的快速接头,回收时没能把螺丝圈回收回来,因此无法修复使用,单价65元的接头只能当废铁处理;有的员工把一些设备和材料当成一次性产品,领新、用新成了习惯,大手大脚造成浪费;有的单位领料员盲目报计划,使一些设备和材料出现积压,一旦设备更新换代,这些设备和材料就成了废铁。

近五年,只有12个人的修旧利废班累计修理、复用的废旧物资价值已达近千万元,按购置新材料价格的三分之一计算,直接为煤矿节约材料费用约3000万元。

投身于平淡却又复杂的科研工作中。“农业科研就是这样,必须抓季节,抢时间。”

黄宗洪对农业科研的热爱,出于他骨子里对土地的情感和对民生的关怀。“像我这样出身农民的人都干不了农业科研这种辛苦的工作的话,就再没有人愿做了。”他时常以农民自比,以此自我鞭策。这一情怀和胸襟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

黄宗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在收成不好的年月里,尽管大人们努力地在黄土地上耕种,却还是填不饱肚子。黄宗洪从小学到中学,课余时间就帮着父母下地做农活,深深体会过农民的艰辛。让农民吃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成为他心中潜移默化的梦想,也造就了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勇气。上大学后,黄宗洪毅然选择了农学专业,为了实现他心中的理想踏上了奋斗之路。

农业科研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育种工作尤其寂寞乏味。自1982年起,黄宗洪心甘情愿地在这条

常人难以胜任的岗位上奋斗了30余年。一年四季,南来北往,从没有节假日;不管风吹雨打、烈日、按时、按质、按量在田里观察、杂交、赶花粉,都是必须的程序。艰苦的条件、简单的生活对于黄宗洪来说算不了什么。他表示:育种工作每道程序、每个阶段的严格要求,才是对责任、对科学精神的考验,是每个育种工作者必须直面的。要实现梦想,就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付诸行动。

正是黄宗洪对农业科研的专注和努力,令他不断收获成功和荣誉。黄宗洪主持选育了贵州省第一个迟熟型三系杂稻“1优4761”,后又相继主持选育了两系杂交稻“两优211”、“黔两优58”、“协优385”和“安优136”等等品种。这些杂交稻均获贵州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累计在省内外推广应用水稻自育品种面积达1000余万亩,增产粮食5亿多公斤,新增效益7亿多元,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